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0-44

2010年10月13日

緬懷經濟學家林子力

吳象

林子力是福建連江人，生於 1925 年，長得頗長健壯，繁忙中有種從容瀟灑的風度。他常常深夜埋頭寫作，終於積勞成疾，幾次病倒。不能起立，不能執筆，但仍然斷斷續續頑強地口述和修改他的《理論經濟學導言》，直至不能說話，不能認人，不能思維。2005 年 8 月，他停止呼吸時，年屆 80，正當學術思想比較成熟之際，撒手西去，至為可惜。

飛出密雲濃霧的第一隻報春燕

文革十年浩劫，四人幫揮動“批判唯生產力論”的大棒，“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導致經濟倒退。1975 年 1 月

鄧小平復出後，找到幾個不贊成“四人幫”的秀才，成立了國務院研究室，由胡繩、于光遠、胡喬木、吳冷西、鄧力群、熊復、李鑫七人為領導人，重點抓經濟理論問題，想衝破極左輿論，把生產搞上去。

當時林子力被借調到國務院研究室工作。鄧小平不久後下臺，研究室陷入癱瘓。當此動蕩不安之時，林子力向于光遠提出，看來駁倒“批判唯生產力論”是個迫切的問題，所以想寫本小冊子。于光遠十分贊同他的想法，介紹有林同他合作，他們一遍又一遍查閱馬、恩、列、斯、毛的著作，搜集有關資料，悄悄動手批判“四人幫”的謬論。1976年10月6日，忽然傳出大喜訊：“四人幫”被抓起來了，全國一片歡呼。不過局勢還不很明朗，思想仍然比較混亂，報刊上“兩個凡是”叫得很響。林子力、有林加緊書稿的寫作。1977年3月，協助他們寫作的戴成找到人民出版社一位副總編輯和黨組書記，商議出版事宜。想不到對方竟要求作者寫個保證書，保證出了問題作者自己負責，而且限印五百本。廣東人民出版社社長楊奇聞訊後氣憤不平，豪爽地說：“他不敢出我出，印五萬本！”並立即帶一位編輯飛到北京。1977年6月，《評“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由廣東人民出版社作為徵求意見稿內部發行。這本小冊子大受歡迎，很多地方翻印，確切的發行數量連楊奇也搞不清楚。當時的中央委員幾乎人手一冊，都仔細看了。胡耀邦、羅瑞卿等同志表示支持並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議。1977年11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連續廣播了這本書的全文。翌年2~3月份，應聽眾要求，又重播了一次。人民出版社得知鄧小平說過“可以出版”之後，也改變了態度，主動和廣東方面協商，議定由兩家聯合出版。又經過三個月修改補充，正式定名為《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於1978年3月出版，第一版就印刷了14萬冊。這一本書，有人稱之為十年浩劫後思想上撥亂反正的第一隻報春燕。

“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我與子力相識在 1979 年夏天。他與馮蘭瑞及陳進玉、左方到安徽調研考察，當時我剛剛調到安徽，任省委副秘書長，負責接待和協助他們工作。在合肥時，我們接觸不少，他對安徽農村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動向饒有興趣。當時他已敏銳感覺到農村改革可能走到其他各業的前頭，農民積極性高，創造了許多“新名堂”。他想把自己調查研究的重點，由國營企業轉向農村，從農村改革實踐的調查、分析入手，然後及於其他領域。當時包產到戶前途未卜，反對者橫加指責，贊成者據理力爭。我們都贊成包產到戶，觀點相同或相似，頗談得來。

1980 年 2 月的五中全會，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出任總書記，中央決策層出現了一些新人。改革很快向各個領域延伸展開，並醞釀開放經濟特區，顯示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已經開始。

1980 年 5 月，我調到北京，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林子力是室務委員兼理論組組長，我們成了朝夕共處的同事，彼此的辦公室是緊隔壁，後來在毛家灣的宿舍又是門對門。我們不止一次結伴下去作調查研究，共同主持一些研討會，共同出席過北京和外省的研討活動。我分工負責處理農村方面的材料，他是專門搞理論的，但因為關注重點的轉移，便成了鼓吹農村改革的戰友。

農村改革前期，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發佈五個《一號文件》，推動農村改革一步一步向前發展，這在 20 世紀 80 年代是很著名的一件大事。1982 年第一個一號文件，把過去視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包產到戶、包乾到戶，開始歸屬於各種形式的集體農業責任制之列，上了姓“社”的戶口。農民歡呼聲之高，幾乎不亞於粉碎“四人幫”。1983 年初第二個一號文件，又有了一個重大突破，把包乾到戶（即大包乾）定名為“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聯產承包制”，說它是“在黨的領導

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這句話寫進文件，經歷了一個過程。負責起草一號文件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在杜潤生的領導下有種好的風氣，重視實踐經驗的概括，重視不同意見的討論。有人在文件草稿中採納了這個觀點，得到多數人的贊同，認為這個觀點可以在更高的層次上徹底解決糾纏包產到戶姓“資”姓“社”的問題。然而，困難在於文件沒有篇幅詳細闡述理由，直接採用這個觀點，恐怕中央審查時難以通過。中央書記處審定第二個一號文件時，我作為工作人員，也列席參加了這次會議，不想文件竟順利通過了。雖然對文件若干處提出了一些具體修改，但對我們最擔心的這一句話，卻沒有任何人表示質疑。我估計有幾位對包產到戶曾持保留態度的老同志可能要說話，可是會場氣氛輕鬆、活躍，沒有人挑起什麼爭論。倒是會上薄一波頗為感慨地說了一大段話，大意是：對包產到戶與合作化的關係，我是反復深思過的，也不是沒有過疑慮，最初是作為解決當前迫切問題的權宜之計來接受的。但是實踐的發展使我越來越感覺到，對包產到戶的威力老是估計不足，這才意識到自己無形中也受到老框框的束縛。說到這裡，薄老稍稍停頓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說：“我想在這裡，在這個場合說一句話，請不要記錄，也不宜對外公開宣佈，就是我個人認為，‘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聯產承包制’不僅是我國農民實踐中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實際上還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長期以來沒有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這句話大概沒有寫入記錄，可是在場的人一定都會有印象，因為當時會場靜悄悄的，薄老說得很有感情，聽者無不動容。

這個觀點、這個論斷，至少有一半是出自林子力之手。他之所以能首先提出，並不是偶然的。他青少年時期在廈門集美學校求學和任教時就開始接觸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50年代初，到中宣部主辦

的《學習雜誌》工作，又系統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認真啃過《資本論》，對西方經濟學也有涉獵。後轉到經濟政策部門，接觸計劃、物價等具體實踐問題。他善於獨立思考，遇到問題就鑽進去深入研究，因此對蘇聯模式及其經濟學產生了一些看法。當時“蘇聯老大哥”是不能碰的，但他還是間接從方法論的角度寫了一些批評性的探討。1975年“反擊右派翻案風”中，他向于光遠提出要對批“唯生產力論”作反批判，也絕不是一時衝口而出，而是醞釀已久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這一提法，更是他多次調查考察、分析研究的結果。

“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聯產承包制”，是林子力在一次調查考察中提出的。調查組有林子力、我及戴成、朱述先、左方五人。從1982年4月開始，先後到貴州、雲南、湖北、安徽一些地區調查，歷時兩個多月。當時農村改革已成為不可阻擋的大潮，都叫包產到戶，其實門類繁多，名稱不一。我們在考察中不斷比較、研究、篩選，感到還是潯縣小崗村的“包乾到戶”或叫“大包乾”好。因為責任最明確，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簡單，最受農民歡迎。大家的共識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是關鍵，“大包乾”是包得最徹底的形式，不妨作為典型形式，取一個規範的名稱。在此之前，林子力已提出過“財產權利可分解為所有權和佔有、支配、使用或稱經營權這兩個獨立主體”的理論觀點。在考察過程中這個思路有所發展，他提出了“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聯產承包制”的概念。我們非常贊同，一路做過多次討論，回京後由子力撰寫了三萬多字的調查報告上報。在書記處研究室室務會議上討論這個報告時，鄧力群曾以石家莊一個村（他下放勞動時長期住過）的情況為例，對報告使用的普遍性提出質疑。但經過認真討論，還是批准報告作為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情況通報》印發，以文件形式發到縣團級。但最後鄧力群建議我和子力到石家莊那個村去看看。子力去沒去我不知道，我沒有去，因為我已看過河南新鄉的劉莊、江蘇江陰的華西村（後來還看過河南臨潁的南街）。我的看法是只要

當地群眾同意，劉莊、華西村等生產、分配形式應該允許存在和發展，不過這種形式不宜普遍推廣，真正能挽救中國廣大農村走出飢餓、貧困的是大包乾，即“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聯產承包制”。

報告在《情況通報》刊出後，胡耀邦總書記看後表示同意，還對包括分配方法的“標準產量”的提法產生了興趣。萬里在報告上寫了許多眉批，在分析“工分制”的一頁上批語說：“工分是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個報告解決了。”“統分結合、雙層經營”被寫入中央1984年一號文件，影響鉅大，以後多次在文件中被採用，成為一個公認的概念。

僱工問題與深層基礎經濟理論

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聯產承包制度，使整個農村活了。商品經濟蓬勃發展，兼業戶、專業戶、小商店、小作坊、家庭工廠、私營企業大量湧現，隨之出現了請幫工、帶徒弟的現象。於是對包產到戶的爭論剛有緩解，又產生了一個新的更嚴重的爭論，即僱工剝削問題。在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是社會心理所不能允許的，一時間沸沸揚揚。報刊上有文章說，這場爭論是因為經濟學家林子力從《資本論》中找到馬克思的話，通過某種公式計算剩餘價值，請三個幫手、帶四個徒弟可以不視為剝削。即僱傭七人以下不算剝削，不算資本家，不是資本主義；僱傭八人以上就產生了剩餘價值，就存在剝削，要算作資本家，算資本主義。中央據此採取“看一看”的方針，三年後再說。這件事情倒是真的。林子力確實在《資本論》的註釋中找到一個人的資料，但他絕不是從本本上找到幾句話或某個數字就提出政策主張的人。認為中央據此就確定“看一看”的方針，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最近我看到1983年12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一份調查報

告。1983年6~9月，林子力和理論組的同志曾到江蘇、上海、廣東、山西三省一市作過專題調查，走訪了約60個涉及僱工問題的單位，研究了九個省、市部分地區的調查報告。報告首先強調，當時的僱工現象具有多樣性、複雜性、不確定性和可塑性，如果孤立地考察僱工現象，就無法做出科學的判斷。因此，這份報告對複雜的僱工現象區分各種不同的類型，分別做出了具體的分析。報告提出並不是所有的僱工現象都能構成比較嚴格意義的僱傭勞動。“除傳統的變工、換工、零工外，請幫工、帶徒弟有學技術的成分，剩餘價值量小，可以不視為僱傭勞動。同時，僱傭勞動不等於僱傭勞動制度，為發展生產所必需，利大於弊，不妨允許，至少暫不取締，以便為改革摸索經驗。”

我所以要作這樣的摘引，是想展示子力這位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時俱進的深入思考。他沒有因為“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寫進一號文件得到公認而沾沾自喜，更沒有對僱工問題就事論事，淺嘗輒止。找到《資本論》註釋中對現實發展有利的幾句話，在林子力對僱工問題的研究中所佔的分量，實在小而又小，可是20多年之後，這件小而又小的事被記錄下來，而他對僱工問題的考察研究幾乎不為人所知，更不用說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探索與理論貢獻。如果有人這樣對待歷史，似乎有欠公允。

從僱工問題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早在1979年，經過長期潛心研究，林子力對計劃經濟體制已經有一些批判性的觀點，他認為適合於我國現代建設的經濟形式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並以此為題寫了一篇長達四萬字的文章。

當時社會上普遍認為，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是對立的，屬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個概念根本不能成

立。不突破傳統理論障礙，改革就會難以深入下去。林子力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傾注於此，努力突破傳統概念。

1982年國務院農研中心（和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係一個單位、兩塊牌子，主任都是杜潤生）成立後，任命我為副主任。此後我大部分時間在中心工作，但書記處研究室的職務仍兼著，和子力常有工作來往，對僱工問題也常交換意見。

僱工現象1981年開始出現，1982、1983年有新發展，1984年以後發展速度加快。有些同志認為這是農村商品生產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另有些同志深表不安，認為不能老說“看一看”，敞開口發展下去會出大問題。因為1985年冬農村基層黨組織要進行整黨，對黨員僱工需有具體說法。為此，1985年7月上中旬，農研中心奉命在河北承德召開一次座談討論會，參加的有遼寧、河北、天津、陝西、湖北、浙江、山東、廣東八省市農村政策研究室及中央有關單位同志，我邀請子力同志一起前往，共同主持。經過討論，很多人認為，允許請幫工、帶徒弟的政策，實踐證明效果好，反對的聲音逐漸減弱消失，而僱工大戶的問題顯得突出，特別是僱工與雇主收入過分懸殊，一般達到十倍以上，有的更高。會上對此看法分歧很大。子力作了幾次發言，指出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剛剛開始，商品經濟的機制和宏觀調控的手段極不健全，價格體系不合理，空子極多，一些問題要逐漸從全面改革去解決。他的講話理論性強又深入淺出，有利於與會者提高思想、促進共識。

那個時代，溫州家庭工業突出，僱工經營最多，成為衆矢之的，多次被誣為“資本主義復辟基地”。子力和我曾多次到溫州調查考察，為溫州辯誣，寫文章讚揚“溫州模式”。1985年9月，童大林在廈門主持召開了一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討論會，子力發言的題目是“市場的形成是今後經濟改革的關鍵”，也就是要著力於深層的改革。他強調要改革物價制度，以形成產品市場；改革就業、報酬和社

會保障制度，以形成勞動力市場；改革產權制度，以形成資金、地產等產權市場。沒有這三大改革，沒有完整市場體系的形成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很難建立充滿活力的企業，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

堅持探索，鍥而不捨

1979年，林子力寫出〈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形態和經濟規律〉一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黎澍見到後極為讚賞，認為是發聵振聾之作，決定將這四萬字的大作刊登到《中國社會科學》當年10月創刊號首卷。大樣已經印出，正式發表時卻出現了曲折，當時林子力把這篇稿子的清樣送給胡喬木審閱。胡看後沒有吭聲，子力知道是哪幾處的說法讓他不大放心，因為他同胡喬木曾爭議過僱工問題，胡直截了當地說，僱工就是剝削。而林子力卻認為目前即使有點剝削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風物長宜放眼量”，好處多，可以提高經營者的素質和競爭精神，對發展經濟作用大。林子力於是便作了一些修改，再次找他討論。胡提了一些枝節方面的意見，對整個文章的觀點仍沒有表態。可是《中國社會科學》正式出版時，林的文章卻被抽掉了。主編黎澍無可奈何地向林道歉，林才知道是胡喬木的意見。後來胡喬木見到林子力，輕描淡寫地對他說：“你的文章能夠再考慮一下，考慮得更加成熟些再發表也不晚。”1980年，這篇文章的部分觀點才發表在《光明日報》和《經濟研究》雜誌上。

1980年之後，林子力仍然是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組長（室務委員）。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子力參加了這次文件的起草工作。這是全面性改革的第一個中央決議，文件確認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個概念；確認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不可逾越，並確認了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

開；確認了企業必須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確認了指導性計劃的逐步擴大和指令性計劃的逐步縮小。1985年有關文件還確認了建立和發展包括生產要素市場在內的完整市場體系，並在此肯定了宏觀調節主要是間接的，即非指令、通過市場機制而實現的調節。這些觀點都是林子力提出過的。

但是，林子力為此付出了代價。在商品經濟概念尚未被認可的1982年春夏之交，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整黨期間，出現過一份材料，按對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觀點，把經濟學界一些人分為四類：一是主張堅持計劃經濟的；二是主張計劃經濟為主，允許商品經濟小量存在的；三是主張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四是主張實行商品經濟，逐步取代計劃經濟的。這份材料是“白頭文件”，就是既無頭銜也無署名更無簽名或印章的材料，只在少數人中流傳。林子力不知從何處弄到一份，發現自己的名字被列為第四類。幾天之後，召開室務會議擴大會，說是動員整風，主要領導人親臨講話。在討論過程中，林子力起來發言，就這份尚未公開的名單提出質疑，指名道姓對製造這份材料的另一位室務委員進行了揭露。林子力講話時十分冷靜，事實準確，邏輯嚴密，用語到位，不失從容瀟灑的一貫風度。名單製造者坐不住了，急不可耐要插話辯駁，但沒有得逞。林子力稍微提高了聲音說：“請等我說完了再說，你會有更多的時間。”他最後有板有眼地說：“我很瞭解你的特點，就是一門心思向上爬，為名為利，不顧事實，不計手段，弄虛作假，不知廉恥。”被揭露者狼狽不堪，輪到他說話時卻不知道說什麼好，連指使炮製材料的人也不好說什麼了。我覺得林子力實事求是、無所畏懼的氣概和風骨是值得敬重的，於是也做了簡短的發言。儘管比較含蓄，書記處研究室的主要領導也很不高興。若干年後，這個人在香港出了本書《十二個春秋》，寫他改革開放中的經歷，點名斥責的人達數十名之多，其中也沒有忘記點林子力和我的名。

又幾年，因中央的人事更替，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撤銷，林子力便來了農研室（即農研中心），又和我到了一起。杜潤生一貫器重子力，對他深表歡迎。據我記憶，農研室正式舉行的學術報告會只有兩次：第一次報告人是諾貝爾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舒爾茨，另一次的報告人就是林子力。杜老都是親自主持，同一會場，同樣的規格和氣氛。那一段時間子力的心情比較舒暢，工作熱情高昂。及至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農研室撤銷了。杜老及幾個助手、部下，由中央組織部介紹到農業部安置，離職休閑了。中央書記處成立了新的研究室，原來的人馬有的回去了，子力不願再回去，轉到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到了要離退的年齡。不過他這個人，不管環境、條件有什麼變化，心情有什麼變化，對自己的理論探索卻一直全神貫注，鍥而不捨，與時俱進。

林子力一生著作甚豐，其中最重要的我認為應該是三卷本鉅著《社會主義經濟論》，他為此傾注了多年的心血。1983年他就講過此書的初步設想和結構主體，大致分四個部分：一、導論；二、社會主義形態論；三、社會主義微觀經濟論；四、社會主義宏觀經濟論。第一卷1988年出版，第二卷、第三卷1994年才出版，共約一百萬字，堪稱煌煌鉅構。可惜這部鉅著尚需進一步整理打磨。他後來在病中另外撰寫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導論》，具有更深刻的方法論意義：（一）人類勞動的兩重目的；（二）勞動的節約和按比例分配——效率和平衡；（三）生產力和當代生產力的特徵；（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五）生產關係和財產關係。導言約10~20萬字，只是子力未能完成就騎鶴西去了，惜哉！

我同子力最後一次合作共事，是1994年受項南委託籌辦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相關刊物。項南屢遭挫折，卻不失凌雲之志。1980年代主政福建，更是建樹不凡。亦曾因此受到攻擊，飛短流長不斷。他離休後在京擔任了新成立的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提出新的扶貧方針，

要立足於開發，立足於增加農民收入，引進市場機制，發揚民主作風，真正改變貧困地區的面貌。子力和我都是項南的摯友，稱他為項公，多次對此深入交換過意見。1994年一天，他專門找我們兩個商量，要我們為基金會辦一個刊物，我們很贊成，商定取名《中國貧困地區》，出雙月刊，由基金會操辦，我們分任社長和總編輯。項公說，從組稿到出版，一切拜託兩位全權負責。基金會只掛名，我們覺得有什麼事情要商量，隨時可以找他。

但後來由於各種原因，刊物只出了兩期，辦不下去了。有一天我正在美國探親，忽然接到越洋電話，說項公決定停辦刊物，徵求我的意見。我相信不是萬不得已，項公是不會這樣做的。越洋電話不能討論問題，當即表示同意。不久我回到北京，項公已病倒住院，子力也病倒住院了。

1997年11月10日項公因心臟病猝發突然逝世，享年79歲。這位與任仲夷齊名的改革開放大將與世長辭了，所有認識他的朋友和仰慕者陷入深深的悲痛。我同朋友同去項家悼念，但沒有林子力，因為他正在醫院病床上和病魔搏鬥。

我到醫院去探望過子力幾次。開始還好，他努力隱藏著痛苦，甚至有說有笑，後來聽說出院回家，又住了院，他仍不肯停止《社會主義經濟學導言》的寫作。第二次手術之後，被插上管子，不能行動，不能起床，不能握筆，幾經掙扎，後來又不能說話、不能認人，最後變成了植物人。

林子力和項南都是福建人，項公平易近人，和藹可親，風趣可愛，寬厚可敬，任何人與之面對，常如沐春風；子力一介書生，耿直率真，自視甚高，自律亦嚴，自問無愧，偶露咄咄逼人態，終不失禮貌。他們可說是兩種不同的典型，但有一點卻極為相似，即勤於學習求知，善於獨立思考，敢於突破創新，具有實事求是、無所畏懼的氣概和風骨。這一點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和不盡的思念。